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中国的兴趣不仅仅停留于浮华的异国情调，而是对东方知识怀有好奇求知之心，具有建立外交关系和经贸来往的长远考虑。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两位同时在位的东西方伟大君主都怀着振国兴邦的抱负，远望异域，敦睦邦交。在他们统治时期，宗教、贸易和学术以多维一体的方式推动了中西方文化交流进程。

# 路易十四宫廷的中国风尚

在法国历史上，最早向中国派出使者的是在卡佩王朝（九八七年～一三二八年，法兰西王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王朝）鼎盛时期享有「圣路易」之誉的国王路易九世（一二一四年～一二七〇年）。一二五三年（南宋宝祐元年），他派遣方济各会士卢

布鲁克（Guillaume Rubrouck, 一二一五年～一二七〇年）携带亲笔书信前往东方，抵达蒙古汗廷。卢布鲁克受到成吉思汗之孙蒙哥大汗（一二〇九年～一二五九年，后被迫溢为元宪宗）接见，并于翌年携其复信返回法国官廷。然而，分处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法国仍然是两个难以相互

抵达的遥远国度。直到十五、十六世纪之交新航线开辟之后，由路易九世开启的中法之间直接交往沟通的序曲才得以在波旁王朝路易十四（一六三八年～一七一五年）时期得以续写篇章。

## 凡尔赛宫里的「中国风」

路易十四是欧洲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长达七十二年（一六四三年～一七一五年）。在其亲政（路易十四一六四三年继位时尚不满五岁，由太后摄政，宰相马扎然辅助摄政。一六六一年马扎然病逝，二

### 车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中法比较文学与文化，著有《新编法国文学史》《悠远的回响——中法文学与文化》《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修辞及其与中国诗歌的会通》等

十四岁的路易十四亲政）之前，宰相马扎然便大量收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布帛、漆器和家具，其前任宰相黎塞留红衣主教府邸中的东方收藏品中至少有四百件中国瓷器。{Bonnafe, Edmond, (1883). *Recherches sur les collections de Richelieu*. Paris: Plon, p.21} 路易十三幼时使用的餐具中就

有瓷制品。{Héroard, Jean, (1868). *Journal sur l'enfance et la jeunesse de Louis XIII*, tome I. Paris: Firmin Didot, p.280} 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亦终生对中国风物保持浓厚兴趣。凡尔赛宫财产目录清单显示，当时法国王宫的室内装潢中不乏中国风格的家具

和纺织品，登记在案的有真漆柜子、桌子、椅子、屏风、刺绣的丝绸帷幔、青花瓷瓶等，只是几乎没有物件得以留存后世。王公贵族的家族档案或家具清单中也有关于中国物产或是中式图案家居用品的记录。在流传后世的一些版画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当时达官贵人家庭陈设的瓷器、漆器以及中国风格的装饰物件，扇子也经常出现在十七世纪的绘画中。{参考 Belevitch-Stankevitch, Hélène, (1910). *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Jouve et Cie, p.153-165} 由此可见，从十七世纪上半叶开始，别具东方特色的中国产品就已经进入法国宫廷和上流社会。

路易十四五岁登基，一六六一年亲政之际便开始着手修葺建设其父留下的巴黎郊外打猎行宫凡尔赛庄园，特里亚农瓷宫 (le Trianon de porcelaine) 是其下令新建的第一个建筑。这里原是位于凡尔赛庄园西北的一个小村庄，被国王收购后于一六七〇年开始施工。从一六七一年开始，路易十四经常在特里亚农瓷宫逗留休憩或品尝美食，这里也是他与宠妃蒙特斯潘夫人 (Madame de Montespan, 一



一七四二年 弗朗索瓦·布歇 中国花园

布本油画 纵四〇·五厘米 横四八厘米 贝桑松艺术与考古学博物馆藏

画中绘有青花瓷瓶、团扇等中国风格的物件

图片转引自 Florian Knothe (ed.), *Imagining Qianlong: Louis XV's court in Beijing*.

University Museum and Art Galle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7, p.38

六四〇年（一七〇七年）的幽会之地。这是一组由五座单层宫殿构成的建筑群，最大特色是其装饰风格——宫殿外观全部由蓝白彩釉相间的陶瓷装饰，故得「瓷

宫」之名，宫殿内部装饰图案也以蓝白二色为主要色调，与外观协调。宫廷建筑师和史官费利比安（André Félibien，一六一九年—一六九五年）诗意地描述了这个

「风格独特的小宫殿」：「在所有人眼中，这个宫殿犹如仙境：它在冬天里开工，春天时便已完工，好似与周围花园里的鲜花一起拔地而出。」{ Félibien, André,



一九一二年 罗伯特·达尼斯 特里亚农皇家住宅：陶瓷制的特里亚农宫：尝试复原“狄安娜的卧室”

纸本水彩 凡尔赛宫与特里亚农宫国立博物馆藏

图片转引自 [法] 桑德里娜·罗森伯格著，柯梦琦译《凡尔赛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〇二三年，页一三一

(1674). *Description sommaire du château de Versailles*.  
Paris: Gaillaume Desprez, p.9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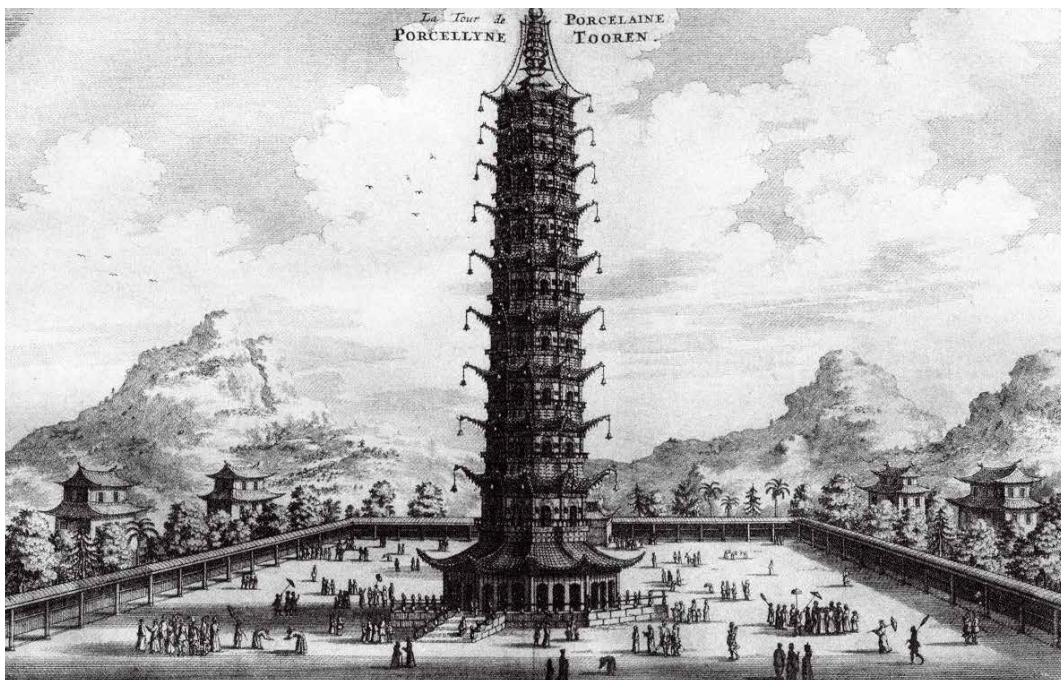
特里亚农瓷宫追逐中国风尚，其灵感来自南京明代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这座宝塔在欧洲享有盛誉，得益于一六五五年至一六五七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访华使团成员约翰·尼霍夫在旅行报告中所作的真实描绘和高度评价，包含百余幅插图的《荷使初访中国记》（*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在一六六四年、一六六五年连续出版了两个法译本，并于一六六九年在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在德国耶稣会士、东方学家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一六〇二年—一六八〇年）的拉丁文著作《中国图说》（*La Chine illustrée*, 1667）中，当时的人们也能够欣赏到南京宝塔的风貌。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随着文字和绘画作品而广为流传，成为欧洲人最为熟知的中国建筑，被冠以「中国瓷塔」之名，甚至被盛赞为堪比世界七大奇迹的伟大建筑。

十七世纪下半叶，在法国的装饰艺术中，陶瓷成为重要元素，但是大量

阅读链接

## 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

◎ 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是明成祖朱棣为报答父母明太祖朱元璋与孝慈高皇后马氏的养育之恩所建。其建造自永乐十年（一四一二年）始，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年）竣工。据明代葛寅亮编纂《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中所收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年）的一道奏报记载，大报恩寺内琉璃宝塔为“九层，通高地面至宝珠顶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另据大报恩寺《塔图附志》记载，建造大报恩寺塔共用钱、粮、银二百四十八万五千四百八十四两，塔身白瓷贴面，拱门琉璃门券，塔檐、斗拱、平坐、栏杆饰有五色琉璃砖，刹顶镶嵌金银珠宝。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之中。自建成至损毁，大报恩寺琉璃宝塔一直是中国南方最高的建筑，被当时西方人视为代表中国的标志性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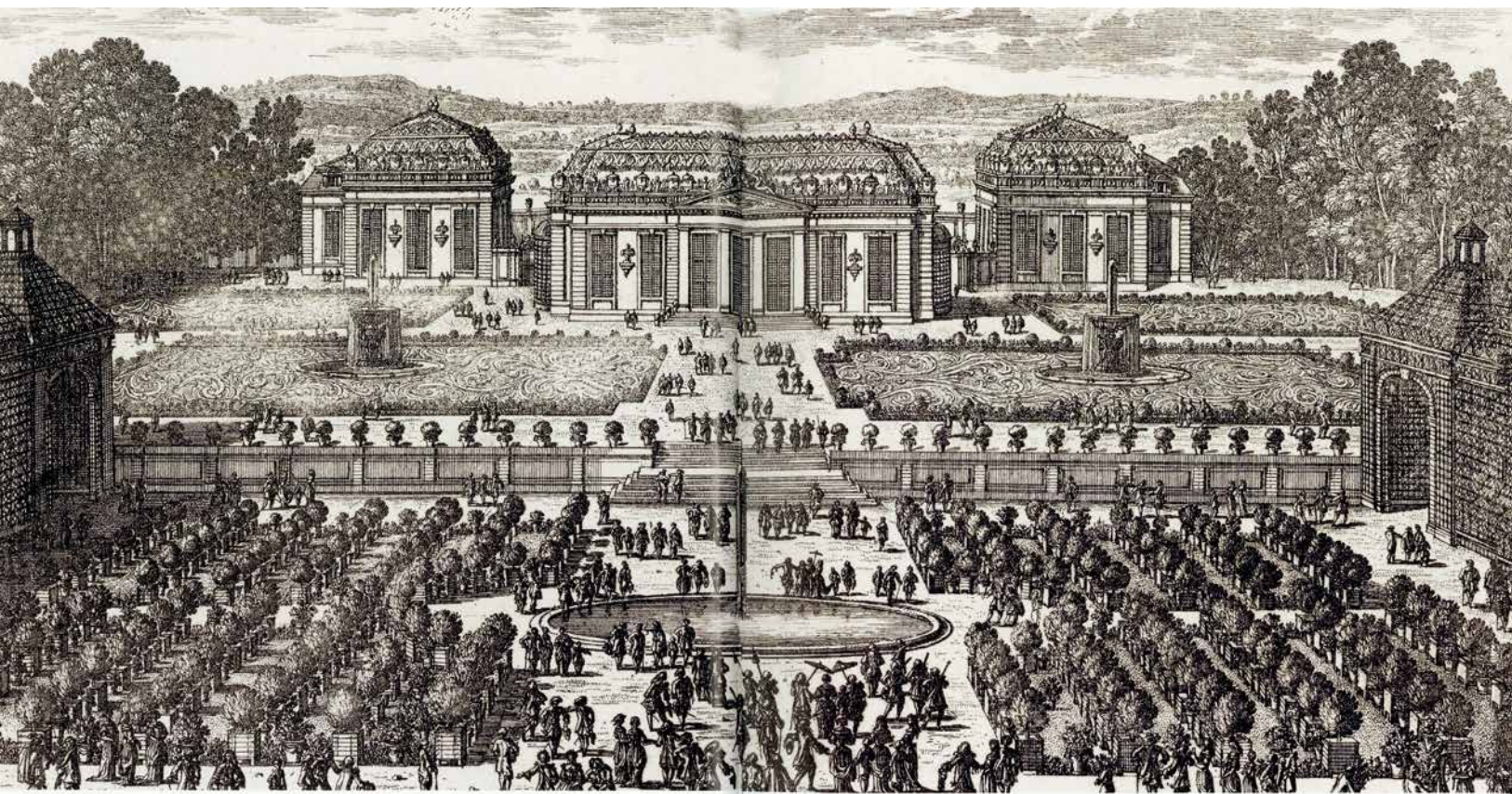
约翰·尼霍夫所著《荷使初访中国记》（一六六五年版）中的版画插图《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

凡尔赛市立图书馆藏

图片转引自〔意〕佛朗切斯科·艾瑞纳著，龚之允、钱丹译《中国风：十三世纪~十九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二二年，页五一

瓷器并不都是来自遥远的中国，而是出自荷兰和法国一些仿制中国瓷器的工厂。法国在十七世纪初已有制瓷工坊，但是产量有限，为此法国宫廷不仅征用国内厂家生产的瓷砖，甚至远至荷兰订制所需陶瓷。然而，当时的欧洲制瓷工艺并不完善，特里亚农瓷宫的陶瓷外墙在常年的风吹雨淋日晒中出现裂缝，且难以维护。一六八七年，厌倦了蒙特斯潘夫人的路易十四也厌倦了特里亚农瓷宫，于是下令将其拆毁，并以粉红色大理石重建宫殿，这就是后来以意大利风格为主的大特里亚农宫。

如今我们只能从流传后世的绘画作品中感受特里亚农瓷宫的风采。十七世纪版画家佩莱勒 (Adam Perelle, 一六四〇年~一六九五年) 和小普瓦利 (Nicolas de Polly le jeune, 一六七五年~一七四七年) 呈现了它兼具古典主义和异域情调的风格。特里亚农瓷宫虽然存世只有十七年，却是欧洲最早的中式风格建筑，引领了欧洲园林的中国时尚，从瑞典的皇后岛 (Drottningholm) 到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城 (Palermo)，从葡萄牙西部辛特拉 (Sintra) 的王室行宫到俄罗斯圣彼得堡



约一六七五年 尼古拉·小普瓦利 特里亚农瓷宫

铜版画

图片转引自 [意] 弗朗切斯科·艾瑞纳著，龚之允、钱丹译《中国风：十三世纪~十九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二二年，页六二~六三

以南的沙皇别墅，都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中式宝塔、茶馆、亭子和庙宇。〔英〕

休·昂纳著，刘爱英、秦红译《中国风：遗失在西方八百年的中国元素》，北京大学出版社，二

〇一七年，页六六

路易十四于一六八二年正式迁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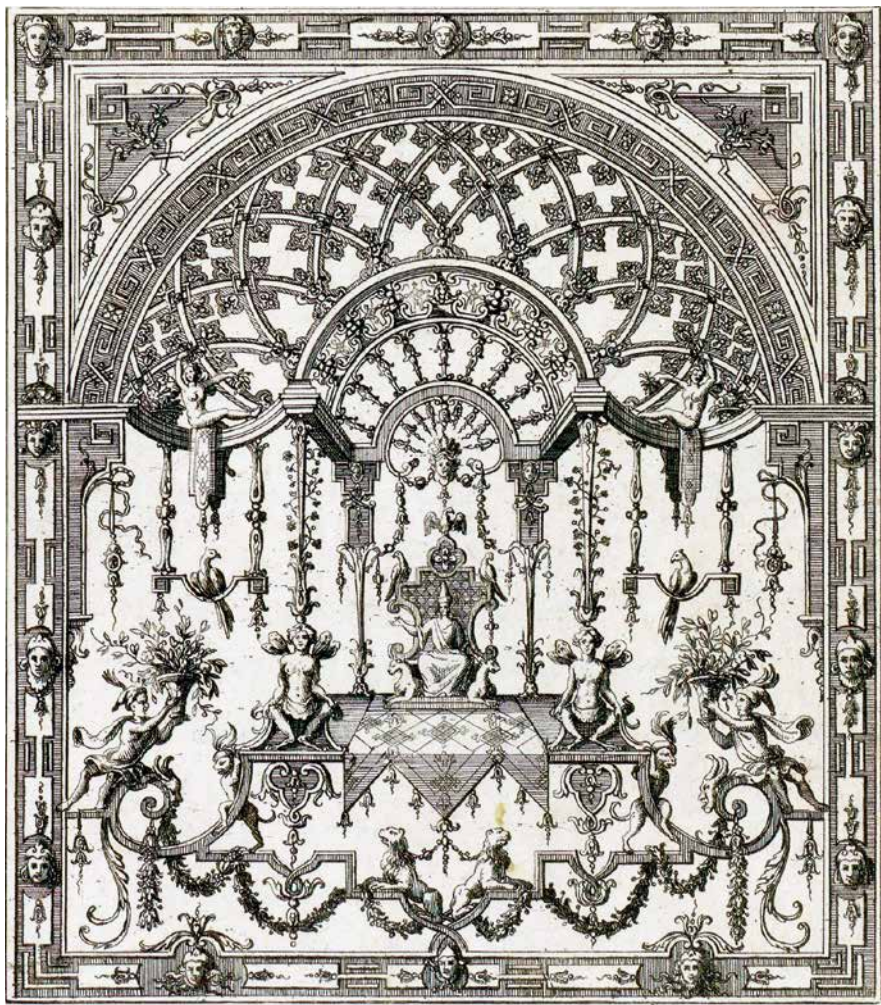
凡尔赛宫，后者的富丽奢华在当时欧洲

各国首屈一指，法国的君主制度在此达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 让·贝兰 中国风装饰画

铜版画

图片转引自〔意〕弗朗切斯科·艾瑞纳著，龚之允、钱丹译《中国风：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二二年，页六七



到鼎盛，宫中歌舞升平，节庆活动甚多。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中国趣味》（*Le*

*Goût chinois en France au temps de Louis XIV*）

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国主题宫廷娱乐活动的细节。早在一六五五年的一次假面舞会中，就出现了身着各式

服装的东方人——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身穿斗篷和戴着面具的中国人

也出现其中。一六六七年，在凡尔赛宫

举办的一次狂欢节中，路易十四以半波斯半中国风格的装束现身舞会之中。在

一六八五年的一场狂欢舞会中，国王的

弟弟（即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更换多套

服装，最后则以一身中国达官贵人的装扮翩翩起舞。一七〇〇年一月七日，官

廷舞会的开场表演主题是「中国皇帝」，

路易十四乘坐一顶八抬大轿，由三十多名身着中式服装的宫廷乐师送驾入场，

之后又有一段「宝塔舞」掀起节庆活动

高潮，王公贵族们都乐在其中。大家意犹未尽，一个星期之后，御弟在凡尔赛

为勃艮第公爵夫人举办了一场「中国风

味美食节」，使用了大量的中国瓷器

餐具，桌布餐巾也尽显中国风格，绘有

中国人物或花卉。（Belevitch-Stankewitch,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中国皇帝」系列挂毯之「天学传概」  
 保罗·盖蒂博物馆藏 博韦制毯厂制造  
 图片转引自「意」佛朗切斯科·艾瑞纳著，龚之允、钱丹译《中国风：十三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二二年，页七一

Helène, *op.cit.*, p.170-174) 凡尔赛宫越来越多地使用瓷器餐具，除了出于美学角度的考虑，也是因为路易十四认为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高档中国瓷器在性价比上优于银质餐具，可以节省国库开支。在重要的庆典活动中，来自中国的丝绸

锦缎常被用作装饰，因为只有如此流光溢彩的布帛才能装点凡尔赛宫的奢华。十七世纪末盛行的「中国风」装饰特色完美地体现在御用设计师和艺术家让·贝兰 (Jean Bérain, 一六四〇年—一七一一年) 的作品中，其影响延续至十八世纪。

他使用一些中国人像、猴戏和宝塔图案来替代法国传统设计中常见的半兽半人和天使图案。由于贝兰的精心设计和安排，宫廷里每一次融入中国元素的庆祝活动都别具一格并且尽显王室的高贵品味。画家华托 (Jean-Antoine Watteau, 一六八四年—一七二二年) 在为宫廷珍宝轩 (「珍宝轩」一词为笔者依归化法翻译的词汇，指法国王室和达官贵人家用于收藏值钱器物的房间或陈设柜。华托设计的珍宝轩在巴黎近郊的缪德行宫 (Château de la Muette) 内) 所作的室内设计中大量使用中国元素，他从一些中国书籍和画卷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在画作中经常融入中国人物和风景，宫廷风和田园风、西方绘画与东方风情糅合为一体。在十八世纪中叶达到鼎盛的法式洛可可艺术正是由于融入东方元素而别具一格，布歇 (François Boucher, 一七〇三年—一七七〇年) 将洛可可风格发挥到极致。他是推崇东方文化的路易十五的御用画家，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为哥布林和博韦两个王家制毯厂设计「中国风」挂毯，「中国皇帝」系列挂毯在一七四二年的法国宫廷艺术沙龙上大放异彩，「中国风第二系列」作品共有十个主题



一七四二年 弗朗索瓦·布歇 中国集市

布本油画 纵四〇·五厘米 横四八厘米 贝桑松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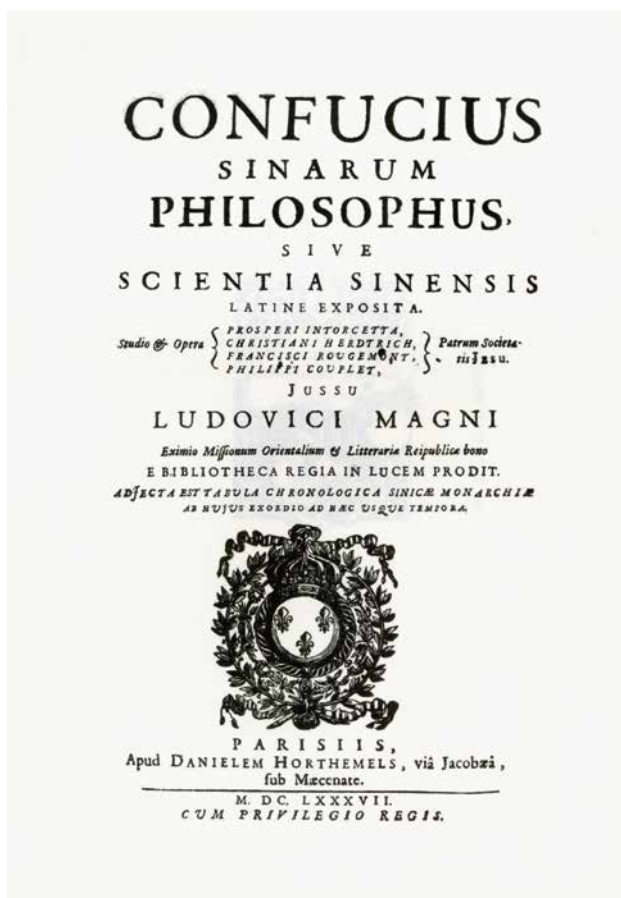
此幅作品为布歇为博韦制毯厂设计的“中国风第二系列”十幅作品中的一幅

图片转引自【意】弗朗切斯科·艾瑞纳著，龚之允、钱丹译《中国风：十三世纪~十九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二二年，页七八

（「中国宴会」「中国集市」「中国舞蹈」「渔翁垂钓与美人」「狩猎」「中国园林」「中国婚嫁」「中国奇珍」「吉祥富贵鸟」「中国皇帝君临」），持续生产到一七七五年，法国王室大量订购，还曾在1767年将一套此系列挂毯赠送给了乾隆皇帝，挂毯最后被置放于圆明园内。（「意」弗朗切斯科·莫瑞纳著，龚之允、钱丹译《中国风：十三世纪~十九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二二年，页七七）

英国学者休·昂纳 (Hugh Honour)

认为法国宫廷自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受到「中国风」的深刻影响，「不容置疑的是，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是中国和其他地域的东方物件热情的收藏家」（《中国风：遗失在西方八百年的中国元素》，页六九），他们对奢华富贵和异国情调的向往同时在中国产品中得到了满足，而且中国艺术品被认为是来自古老帝国的产物，故而可以彰显「太阳王」宫殿的富丽堂皇和法兰西的强大实力。凡尔赛官树立了「中国风」的典范，首先引领贵族们纷纷效仿，又从巴黎传播到外省，甚至影响到中等阶层市民的趣味。在十八世纪初期，「中国风」又作为法国宫廷的装



一六八七年法国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版权页  
图片转引自 [比] 柏应理等著，汪聂才、齐飞智等译《中国哲学家孔子》第一卷，大象出版社，二〇二一年

饰艺术风格流传到其他欧洲国家。

##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巴黎

在十六世纪下半叶，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一五〇六年—一五五二年)、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一五四三年—一六〇七年) 和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先后抵达中国。这些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采取文化适应策略，研习和翻译儒家经典。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1615)，

孔子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

一六八七年 (康熙二十六年)，在法国出版了一部以《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为书名的拉丁文儒家经典译著，参与编译工作的有殷铎泽 (Prospero Intorcetta, 一六二五年—一六九六年)、鲁日满 (Francisci Rougemont, 一六二四年—一六七六年)、恩理格 (Christian Hedtrich, 一六二四年—一六八四年)、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 一六二三年—一六九三年) 等十余位欧洲各国耶稣会士，他们继承了利玛窦等人的文化适应策略。中国人

阅读链接

### 早期到达欧洲的中国人——沈福宗

◎ 沈福宗，顺治十四年 (一六五七年) 生于江苏江宁府 (今南京)，读书而并未参加科举，在结识比利时人柏应理后，从其学习拉丁文。康熙二十年 (一六八一年)，柏应理欲返回罗马教廷，与时年二十五岁的沈福宗一同前往欧洲。沈福宗先后到达葡萄牙 (在此地学习时取名 Michel Alfonso)、罗马 (会见了教皇英诺森十一世)、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康熙三十年 (一六九一年)，沈福宗和柏应理二人搭载荷兰商船启程返华，途中沈福宗突然染病，于非洲东南葡属东非 (今莫桑比克) 附近去世，享年三十六岁。

沈福宗跟随柏应理学习拉丁文，而柏应理在其协助下对《大学》《中庸》和《论语》拉丁文译稿进行补充修订。他们二人于一六八一年底从澳门出发前往欧洲。在十七世纪，来到欧洲的中国人极为罕见，故而沈福宗到达巴黎后引起法国人的广泛兴趣。一六八四年八月，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见柏应理和沈福宗，在晚宴席间颇有兴趣地观看沈福宗使用筷子进食和用中文诵读祷告词。(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二年，页二五)



一六四七年 佚名 梅赫伦的柏应理

谢普斯大主教兄弟会藏

图片转引自〔比〕柏应理等著，汪聂才、齐飞智等译《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一卷，大象出版社，二〇二一年

根据画像上所写文字可知此画像绘于一六四七年，柏应理时年二十四岁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中所附孔子像

图片转引自〔比〕柏应理等著，汪聂才、齐飞智等译《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一卷，大象出版社，二〇二一年，页三三

柏应理在罗马印行《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计划未能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法国王家图书馆馆长德维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一六二〇年～一六九二年）邀请他在巴黎出版。当时，路易十四向耶稣会士颁发刊印特许，由王家印书局公开刊行《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全书卷首致路易十四的献词中，柏应理称其是孔子「热切盼望却一直无以得见的君王」，并写道：「当他们（中国人）知道您愿意让迄今仅在中华帝国闻名的这位孔子的书在高卢传播，并且从高卢远播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他们会多么感谢陛下啊！」（〔比〕柏应理等著，汪聂才、齐

飞智等译《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第一卷《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大象出版社，二〇二一年，页一）虽然柏应理的赞美之语体现了所有此类献词的恭维修辞，但是路易十四给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礼遇也确实推动了儒家学说在欧洲的传播。

同样在一六八七年，法国宫廷和贵族社会中开始流传另外一本讲述孔子学说的手稿，这本手稿出自弗朗索瓦·贝尼耶（François Bernier，一六二〇年～一六八八年）之手。一六五六年（顺治十三年），贝尼耶出发前往东方，两年多后到达印度，在莫卧儿帝国担任宫廷医生约十

年，他撰写的印度游记在欧洲广为流传，从而获得东方学家的赞誉。贝尼耶对印度的政治体制、社会、思想持批判态度，却推崇中国儒家思想。他根据《大学》《中庸》《论语》的主要内容编译完成了一部「孔子之书」，全称为《孔子：君王之道，暨中古代皇帝和官员政治统治特有的道德原则》（*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contenant les principes de la morale particulière du gouvernement politique des anciens empereurs et magistrats de Chine*），并将此书敬献于法国王室，旨在鼓励欧洲君主借鉴中国的政治智慧和统治之道。他恳切地表示：「因为我真诚地热爱我

的国王和祖国，所以认为这些伟人或许能成为我们年轻君主的向导和楷模。很不幸，我们的储君们在一种傲慢、蛮横、苛刻的教育方式下长大，这种方式非常普遍但是相当有害。相反，具备德行的伟人们能够激发出他们的友爱、温和、高尚、纯朴、仁慈和善行，而且不会使他们偏离与生俱来的威严与崇高。这些道德原则终有一天会为国家的利益和信奉者的荣誉带来裨益，而信仰道德的人也必然会被所有的人尊重、推崇和爱戴。」{ *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traduit par François Bernier (1687), introduction et notes de Sylvie Taussig, note sinologique de

Thierry Meynard, Paris, Félin, 2015, p.156} 由此

可见，贝尼耶虚心地将儒家学说纳入到欧洲「君主镜鉴」(specula principum)的教育传统之中。在他心目中，孔子堪当君王之师，儒教学说包含了值得学习借鉴的道德原则和治国理政之道。

贝尼耶手稿的受众是出入贵族沙龙的文艺界、思想界精英人士。萨布里埃尔夫人(Madame de La Sablière, 一六四〇年~一六九三年)主持的沙龙在巴黎享有盛名，这里汇聚着宫廷重臣和名流显贵，

以及莫里哀、拉辛、拉封丹等作家和学者。贝尼耶是萨布里埃尔夫人沙龙的常客，曾经在沙龙中展示手稿和发表观点。贝尼耶在一六八八年将手稿汇集成册，但因其不久即告去世，手稿未能刊行，直到二〇一五年才在法国得到印刷出版。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一份珍贵的贝尼耶手稿作为国礼赠送给当时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珍品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四日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我国媒体在关于此份国礼的报道中皆将其译为《〈论语〉导读》。

值得一提的是，在路易十四时代另

一位法国思想家、神学家费讷隆(François

Fénelon, 一六五一年~一七一五年，一六八九年

被举荐为王孙的太子傅)所著《亡灵对话录》

(*Dialogue des morts*, 1710)中，最长一篇正

是《孔夫子和苏格拉底谈广受扬诩的中国人之优越性》(*Confucius et Socrate, sur la prééminence tant vanée des Chinois*)，作者以

孔子作为苏格拉底长篇大论的陪衬，通过西方先哲之口对中国文化提出质疑和批判。费讷隆反对耶稣会士美化中国形象，或许究其根源，崇古派的费讷隆有

意通过苏格拉底与孔子的对峙来贬低中国，从而彰显其心目中古希腊榜样的优越性。

由是可见，在路易十四时代，不仅大量被视为奇珍异宝的中国器物进入凡尔赛宫，中国的思想智慧也为君主、宫廷和上流社会所了解和发现，中国知识必然与欧洲的文化传统、思想意识和宗教体系在接触中发生碰撞。总体而言，路易十四虽然对内实行专制强权，却对来自东方的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保持了一种开放容纳的心态。

## 从暹罗进入中国

最早进入法国宫廷的大量中国器物来自欧亚贸易。从贸易角度而言，葡萄牙、英国和荷兰走在了前列，成立于一六〇〇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力最强，两年后出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直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风靡法国上流社会的中国商品其实首先来自荷兰和英国人与亚洲的贸易，而法国人很少参与其中。一六四二年，主理朝政的黎塞留红衣主教在去世前感慨法国人因为缺乏远

渡重洋的勇气和决心而忽视了与东方的贸易，而他们本可以从东方的香料、丝绸、瓷器、茶叶贸易中获得财富。（参考 Belevich-Stankevich, Hélène, op.cit., p.146-147）为了与早已进入亚洲的其他欧洲列强开展商业竞争，路易十四下令由财政大臣柯尔伯于一六六四年成立法国王家东印度公司，但是它仍然只能立足于东南亚国家以获得中国商品，并不能与中国直接开展贸易。如何进入中国一直是路易十四关心的问题。

拓展双边关系的愿望也来自路易十四的科学兴趣。伏尔泰曾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称为「千载难逢的兴隆盛世」（「法」伏尔泰著，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铤译，吴模信校《伏尔泰文集》第七卷《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九年，页四六一），因为这位国王注重发展和扶持科学和艺术，执政后创办了法兰西王家科学院、美文学院、天文台等学术机构，天文观测和地理勘察都成为路易十四关心的科学事业。根据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一六四三年—一七一〇年）的书信，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在法国，人们正根据国王的诏令，为改造地理学而

工作。王家科学院的先生们奉命负责此事，他们派遣了其团体中最精明能干的人赴大西洋和地中海各港口，英国、丹麦、非洲和美洲诸岛屿，在那里从事必要的考察。大家对遴选将被派往印度和中国的人员感到最为棘手，因为这些地区在法国较少被人所知……」（《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一七〇

三年二月十五日于舟山》，「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二五一）吸引路易十四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奇珍异宝，也是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地理、科学、政治和社会制度。帕尔迪（Ignace Causton Parides, 一六三六年—一六七三年）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耶稣会士科学家，他通过早

一六八七年 暹罗使团进呈国书与召见仪式图  
蚀刻板画 纵八八厘米 横五五厘米 凡尔赛宫与特里亚农宫国立博物馆藏

此画表现了暹罗国王刻在金叶上的信于一六八六年九月一日抵达凡尔赛宫廷时的场景。画面右下角的缘饰中，「国王派往暹罗的院士们」即将登上使团的船只。



期来华耶稣会士的记述了解到中国自古以来便设有天文观察台和钦天监（汤若望和南怀仁曾掌钦天监），并对此表示推崇。他在一六七一年将其著作《几何原理》（*Eléments de Géométrie*）献给王家科学院，希望后者能够像中国的钦天监那样成为评判学术的权威机构，同时更是为了激励法国超越中国、彰显国力和传播国誉，「需得一位如我国君主一样的国王方能弥补欧洲的声音，需得诸位院士方能将国王的光辉远播四方，令世人皆知在我国各位贤才之臣的治理之下，法兰西可以比任何其他国家胜任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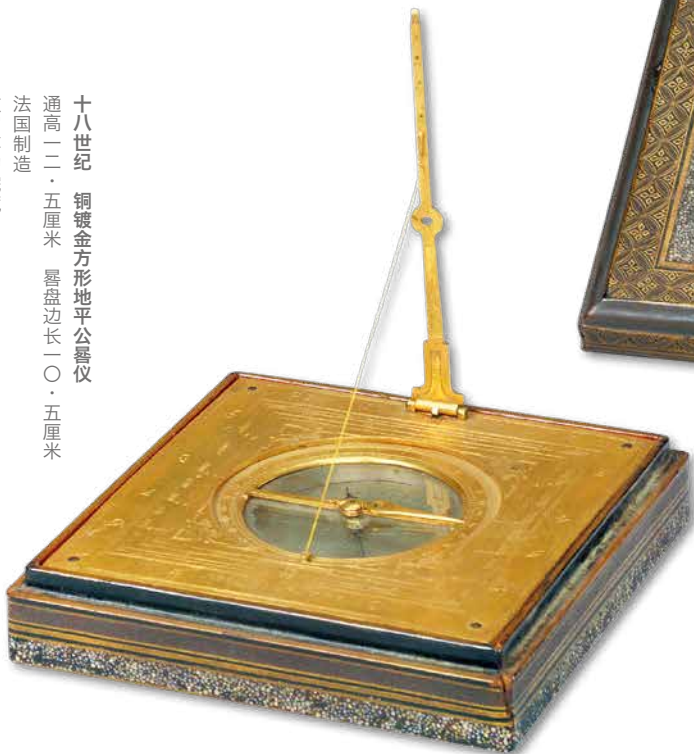
{Parides, Ignace Gaston, (1671). « A Messieurs de l'Académie royale », in *Eléments de Géométrie*, Paris: Sébastien Mabre-Crampey, Imprimeur du Roy, p.6} 可以想见，已成为欧洲霸主的路易十四未尝没有深入了解中国以判高下的想法。外交往来也是路易十四显示法国实力的机会，每当他在凡尔赛宫接见外国使节时，都会竭力展现宫廷的奢华与国力的强大，这一点在其与波斯和土耳其的交往中已经有所体现。

可惜，法国在海外贸易上落后于其他欧洲强国，加之其在与中国和印度的



十八世纪 铜镀金八角形赤道公晷仪  
晷盘长一五厘米 宽一三·一厘米  
法国制造  
故宫博物院藏

十八世纪 铜镀金方形地平公晷仪  
通高一二·五厘米 晷盘边长一〇·五厘米  
法国制造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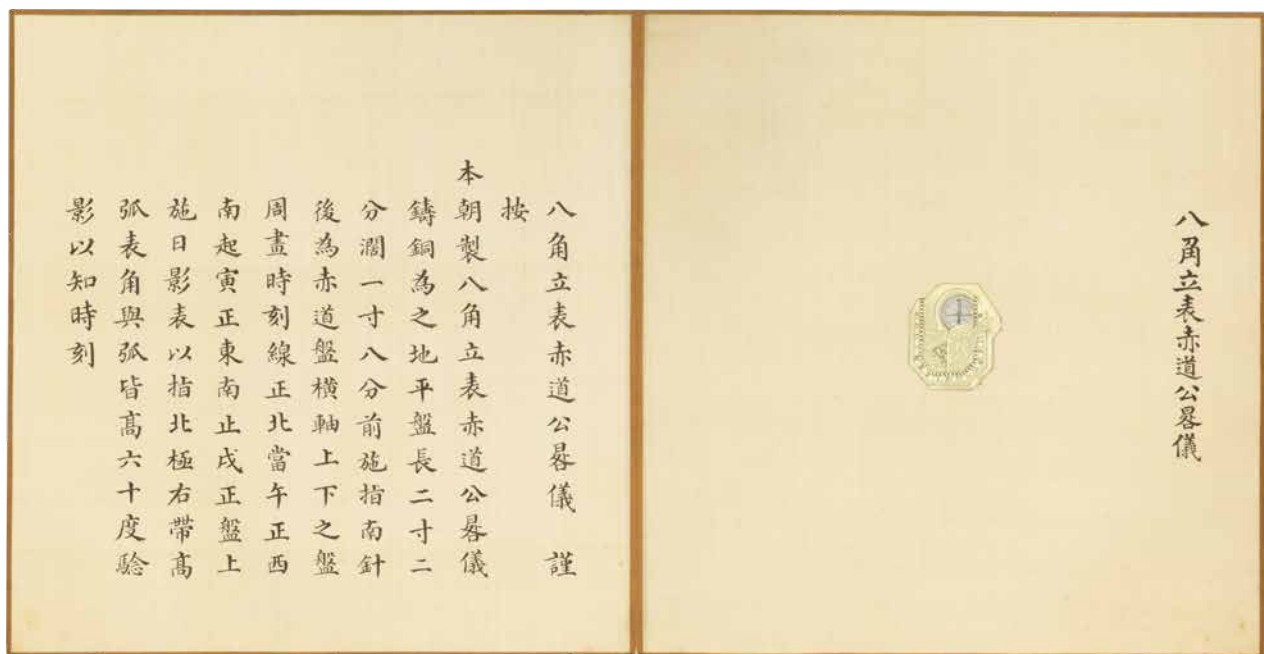
直接交往中始终没有合适的人选，「大家对遴选将被派往印度和中国的人员感到最为棘手……且科学院的先生们还认为，在那里可能会有不受欢迎以及使执行计划的外国人感到不安的危险。由此，人们把目光转向了耶稣会士们，后者在整个这一地区拥有传道团」。（《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一七〇三年二月十五日于舟山》，《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页二五一）于是路易十四产生了利用耶稣会士与清朝政府直接建立联系的想法，这一点在柏应理一六八四年觐见路易十四的时候便有所探讨。路易十四的忏悔师拉雪兹神父（François de la

Chaise，一六二四年—一七〇九年）认为科学考察是国王派遣耶稣会士的重要动机之一：「国王陛下热心科学，竭尽全力从外国获取科学知识，他下令选择一些精通数学的传教士前去进行必要的考察，以便修正海图和地图。这些传教士尤其应该学会中国人的主要工艺和科学，搜集足够的书籍以充实我们的图书馆，培养翻译人员……」{Lach, Donald F., (1957). *The preface to Leibniz's Novissima Sinica: commentary, translation, tex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53} 这一计划最终能够得以付诸实施，很可能是暹罗（泰国古称）官员访法事件提供了机遇。一六八四年，两位暹罗官员抵达法国，满足了法国人对这个东方国家的好奇。暹罗官员带来的瓷器、玉器、漆器、纺织品等礼物大多数产于中国，从某种意义上又强化了法国宫廷对中国的兴趣。路易十四有意与暹罗建立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因为暹罗是法国人唯一能够立足以拓展对华贸易的国家（一六六二年，法国人到达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并常驻下来），故而在—一六八五年决定遣使回访暹罗。

传统上，耶稣会士是要由罗马教宗派遣的，罗马教宗已然认定亚洲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路易十四决定无视教廷意见而独立派遣六名法国耶稣会士以王家科学院院士的身份前往东方。由于无法获得充满戒心的葡萄牙耶稣会的交通许可，比较合理且便利的安排便是让六名法国耶稣会士与派往暹罗的法国使节同行。以洪若翰为首的四名法国耶稣会士组成的法国赴华使团需要服从法国国王的世俗权力，并以学术考察作为其宗教和外交使命之外的又一重要使命，

《皇朝礼器图》册中的「八角立表赤道公晷仪」





十八世纪 铜镀金单游标女神像半圆仪及俯视图局部  
盘半径二六厘米  
法国制造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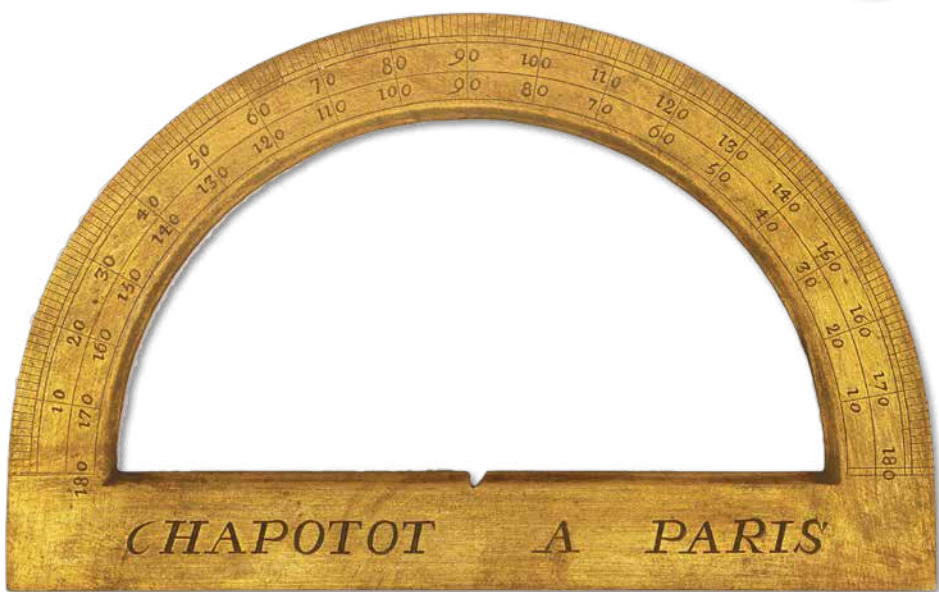
十八世纪 铜镀金双千里镜全圆仪及俯视图部  
通高三三厘米 盘直径二二·五厘米  
法国制造  
故宫博物院藏



十七世纪 铜镀金比例规  
长一七·五厘米 宽四厘米 厚〇·五厘米  
法国制造  
故宫博物院藏



十七世纪 铜镀金半圆仪  
高七·五厘米 厚〇·一厘米 半圆直径六厘米  
法国制造  
故宫博物院藏



路易十四的重臣柯尔伯生前曾对洪若翰表示：「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测，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拉雪兹神父的信，一七〇三年二月十五日于舟山》，《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页二五一）

于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夏天抵达中国宁波，翌年获得许可进入北京。他们受到康熙皇帝接见，并进献了路易十四赠送的欧洲天文仪器和数学仪器。最终，这五人中的白晋（Joaquim Bouvet，一六五六年～一七三〇年）和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一六五四年～一七〇七年）被宫廷留用，洪若翰、李明（Louis le Comte，一六五五年～一七二八年）、刘应（Claude de Visdelou，

一六五六年（一七三七年）则获准可以前往中国各省。他们遵循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一方面习得中国语言文字和研究翻译古代经典，另一方面为康熙皇帝讲授西学，深受其赞许。他们同时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著述成书，或以书信形式传递回欧洲，这些中国知识后来成为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所参照的思想资源。

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1696）

在欧洲广为流传，其中一幅康熙皇帝的画像颇受欢迎。在李明的描述中，康熙皇帝是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伟大君主，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温和适度。路易十四从白晋神父寄自北京的报告中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并从他敬献的《康熙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Chine, 1697）中了解到同时代遥远东方的另一位「太阳王」。白晋认为康熙皇帝「从许多方面来看，都与陛下极其相似」，是世界上「最值得您尊重和友待的君主」。

{Bouvet, Joachim, (1697).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Chine. Paris: E. Michallet, p.4, 263}

白晋成为康熙皇帝和路易十四之间



清人绘 玄烨朝服像轴（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中的康熙皇帝像  
图片转引自 [法] 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一六八七～一六九二）》，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页五三

的特使，他在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奉命返回法国招募耶稣会士，携带珍贵书籍四十九册赠送法国国王。一六九七年三月，正是在这位耶稣会士的推动下，由军舰改装的第一艘直航中国的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载着第二批赴华耶稣会士从法国西北港口出发。一六九九年，白晋携带路易十四的书信和回赠的艺术品，带领耶稣会士们回到北京，而「昂菲特里特号」于

一七〇〇年从广州满载中国物产返航法国，完成了法国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直接贸易。

路易十四一直致力于与中国、日本、暹罗、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国家建立或加强政治经济关系。他对中国的兴趣不停留于浮华的异国情调，而是对东方知识怀有好奇求知之心，具有建立外交关系和经贸来往的长远考虑，此外，法国王室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其对东方世

界的广泛关注密切相关。路易十四以主动的姿态，康熙皇帝以宽仁的心怀，借助耶稣会士为桥梁，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缔建了友好亲善的中法关系。尽管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两位同时在位的东西方伟大君主都怀着振国兴邦的抱负，远望异域，敦睦邦交。在他们统治时期，宗教、贸易和学术以多维一体的方式推动了中西方文明交流进程。





一六九七年刊印的《中国近况人物》中的人物画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片转引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二〇一四年，页一二二~一二三

本书为铜版印刷，根据白晋从中国带回的图画制成，以全页方式介绍清朝上层阶级